

從聚落到鄉里

——敦煌等地胡人集團的社會變遷*

榮新江

一、有關粟特聚落與聚落首領薩保的已有研究成果

粟特人，在中國史籍中又被稱為昭武九姓、九姓胡、雜種胡、粟特胡等等。粟特人的本土位於中亞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澤拉夫珊河流域，即西方古典文獻所說的粟特地區（Sogdiana），在大大小小的綠洲上，分佈著一個個大小不同的城邦國家，有康、安、石、史、曹、米、何等國，不同時期，或有分合，有時不止九個國家¹。

在公元3至8世紀，也就是大體上相當於中國的漢、唐兩朝之間，由於商業利益的驅使，以及粟特地區的動亂和戰爭等原因，粟特人沿傳統意義上的陸上絲綢之路大批東行，經商貿易。他們的東來，往往是以商隊（caravan）的形式，由商隊首領（caravan-leader）率領，結夥而行，少者數十人，多者數百人，並且擁有武裝以自保²。

粟特商人在絲綢之路上的一些便於貿易和居住的地點留居下來，建立自己的殖民聚落，一部分人留下來，另一部分人繼續東行，去開拓新的經商地點，建立新的聚落。久而久之，這些粟特聚落由少到多，由弱變強，少的幾十人，多者多達數百人。在中原農耕地區，被稱為“聚落”；在草原遊牧地區，則形成自己的“部落”。因為粟特商隊在行進中也吸納許多其他的中亞民族，如吐火羅人、西域（塔克拉瑪干周邊綠洲王國）人、突厥人加入其中，因此不論是粟特商隊還是粟特聚落中，都有多少不

*本文是在提交2009年1月24日在京都大學舉行的“多民族的敦煌”研討會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

¹關於粟特王國的古地今名，參考張廣達為《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所寫的相關條目。粟特歷史，B. I. Marshak, “Sughd” (Sogdian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 vol.III. UNESCO Publishing, 1996, 233-258.

²榮新江《北周史君墓石槨所見之粟特商隊》，《文物》2005年第3期，47-56頁+圖1-6。英文摘譯：“The Sogdian Caravan as Depicted in the Reliefs of the Stone Sarcophagus from Shi’s Tomb of the Northern Zhou”, *Chinese Archaeology* (中國考古學), vol.6,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6.12, pp.181-185+figs.1-4.

等的粟特系統之外的西方或北方的部眾，所以，我們把粟特聚落有時也稱為胡人聚落，可能更符合一些聚落實際的種族構成。

從十六國到北朝時期，這樣的胡人聚落在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中原北方、蒙古高原等地區都有存在，散佈十分廣泛。通過學者們歷年來對粟特文古信札（Sogdian Ancient Letters）、敦煌吐魯番發現的漢文和粟特文文書、中原各地出土的漢文墓誌材料，我們已經可以比較清晰地勾勒出一條粟特人東行所走的絲綢之路，這條道路從粟特本土出發，經怛邏斯、碎葉、弓月到北庭，或是沿西域北道的據史德（今新疆巴楚東）、龜茲（庫車）、焉耆、高昌（吐魯番）、伊州（哈密），或是從勃律、渴盤陀，沿西域南道的于闐（和田）、且末、石城鎮（鄯善），進入河西走廊，經敦煌、酒泉、張掖、武威，再東南經天水、原州（固原），入長安（西安）、同州、洛陽，或東北向靈州（靈武西南）、夏州（統萬城）、并州（太原）、雲州（大同東）乃至幽州（北京）、營州（朝陽），或者從洛陽經衛州（汲縣）、相州（安陽）、魏州（大名北）、邢州（邢臺）、定州（定縣）、幽州（北京）可以到營州，另外，還有經西平（鄯州，今西寧）南下吐蕃之路，還有從并州南下介州的南北道路。在這些道路上的各個主要城鎮，幾乎都留下了粟特人的足跡，有的甚至形成了聚落³。

就這樣，粟特人在絲綢之路沿綫的一些城鎮周圍建立殖民聚落，形成一個個以薩保為首領的自治共同體，居民以胡人為主體，主要經營商業，祆教信仰成為聚落的凝聚力。這些聚落之間相互關聯，形成一個貫通東西的貿易網絡。

這種有組織的粟特商隊（caravan-leader）的首領，粟特文叫做 *s'rtp'w*，漢文音譯作“薩保”、“薩甫”、“薩簿”、“薩寶”等，就是“商隊首領”的意思。薩保的粟特文原語，是吉田豐教授從寫於公元4世紀初葉的粟特文古信札中找到的⁴，最近，這一比定得到了新發現的史君墓粟特文和漢文雙語對照書寫的銘文的確證⁵。結合漢文文獻中大量的有關薩保的記載，我們知道薩保不僅是粟特商隊行進中的領袖，而且也是粟特人建立的聚落統治者，由於大多數早期東來的粟特人信奉的是粟特傳統的瑣羅亞斯德教（中國稱之為祆教、拜火教），所以聚落中往往立有祆祠，薩保也就成為粟特聚落中的政教大首領。

粟特聚落原本是粟特商團或移民建立的殖民地，和所在地的官府沒有統屬關係。但是，從北魏到隋、唐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為了控制這些胡人聚落，極力把首領薩保

³榮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馬大正等編《西域考察與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157-172頁；又《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國學研究》第6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27-85頁；兩文收入《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19-36、37-110頁；又《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補考》，《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1-11頁；又《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補考》，《歐亞研究》第6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165-178頁。

⁴吉田豐《ソグド語雜錄（II）》，《オリエンツ》第31卷第2號，1989年，168-171頁。

⁵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楊軍凱、孫武執筆）《西安北周涼州薩保史君墓發掘簡報》附錄，《文物》2005年第3期，31-32頁。

納入中國傳統的官僚體制當中，把薩保任命為中央和地方的一級職官，並設立薩保府。於是我們在史籍和墓誌中看到，一些胡人首領成為京師薩保、諸州薩保，在薩保府的下面，有薩保府長史、司馬、果毅、祿正、祿祝、府率、府史等官吏，管理聚落行政和宗教事務。唐朝時期，我們看到有些薩保府立於祿祠之中，表明胡人聚落仍保持著其中亞本國政教合一的制度。中央政府還派出檢校薩保府的官員，來控制胡人聚落，如虞弘在北周末年，就曾檢校并、代、介三州薩保府⁶。

從史籍和墓誌所輯錄的材料來看，大概從北魏時開始，中原王朝就在都城洛陽設京師薩保，而在有粟特聚落的地方設州一級的薩保，我們見到有雍州、涼州、甘州等地薩保的稱號。以後西魏北周、東魏北齊都繼承了這一制度。北齊有京邑薩甫、諸州薩甫。另外，史料中還見有北齊并州薩甫、定州薩甫以及薩甫下叫“司錄”的一種職官。北周也有京師薩保，墓誌材料還有涼州、酒泉、同州、并州、代州、介州等州一級的薩保，如新發現的史君墓主人是涼州薩保，安伽是同州薩保。從名稱來看，隋代繼承了北周的制度，有雍州（京師）薩保和諸州薩保。

我們在史料中常見到的稱呼粟特聚落統治者的詞，是“首領”或“大首領”，如敦煌寫本 S.367《沙州伊州地志》云：“石城鎮，本漢樓蘭國。隋置鄯善鎮，隋亂，其城遂廢。貞觀中（627-649），康國大首領康豔典東來，居此城，胡人隨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⁷又同卷伊州條記：“隋大業六年（610）於城東置地置伊吾郡。隋末，復沒於胡。貞觀四年（630），首領石萬年率七城來降。我唐始置伊州。”⁸又，《唐故陸胡州大首領安君（菩）墓誌》記：“其先安國大首領，破匈奴衙帳，百姓歸□□國。首領同京官五品，封定遠將軍，首領如故。”⁹可見，粟特“薩保”的意譯是“首領”，“摩訶薩寶”或“摩訶大薩寶”的意譯也就是“大首領”。

二、近年研究的新進展：從聚落到鄉團、軍府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力圖控制粟特聚落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利用粟特聚落的武裝力量。因此我們看到，自北朝末到唐朝初年，一些擔任粟特聚落首領薩保的頭銜上，開始加上了一些府兵將領稱號，如“都督”、“帥都督”、“大都督”、“儀同”、“開府”等，率所屬鄉兵、鄉團隨軍作戰，或駐守某地。這類“鄉兵”或“鄉團”本是地方豪強招集鄉里居民建立的地方私人武裝，北周中央政府通過這種方式，逐漸將鄉兵納入到府兵體制之下¹⁰。北朝其他政權和隋、唐政府也是用同樣的方式，把粟特地

⁶張慶捷《虞弘墓誌考釋》，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162-165頁。

⁷池田溫《沙州圖經略考》，《榎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山川出版社，1975年，91頁。

⁸唐耕耦等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錄》一，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39-40頁。

⁹《全唐文補遺》第4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402-403頁。

¹⁰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谷霽光史學文集》第1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方武裝變成自己的軍事力量，關於這一點，山下將司氏和蘇航氏以不同的方式做過論證，可以參看¹¹。以下舉幾個例子¹²：

北周都城長安（今西安）東郊出土的《安伽墓誌》（大象元年/579年撰）記載，誌主先“除同州薩保”，其後又“除大都督，董茲戎政，肅是軍容，志効雞鳴，身期馬革”¹³。可知，安伽任關內道同州的薩保，管理粟特聚落；隨後又任大都督，管理軍政。聯繫北周時期的鄉團政策，他以大都督身份所率領的軍隊，很有可能就是粟特聚落中的鄉團。

陝西最北部的統萬城出土的《夏州天主儀同翟曹明墓誌》（北周大成元年/579年撰），記誌主乃“西國人也”，“祖宗忠烈，令譽家邦。受命來朝，遂居恒夏。君幼懷歧嶷，長有才雄。喁喁當官，恂恂鄉邑。傷魏載之哀泯，慨臣下之僭凌（凌）。慕義從軍，誅除亂廷巨猾。摧峰六軍，振振奪賞。”¹⁴也就是說，他原本在鄉邑當官，任職“天主”¹⁵，則其必為當地粟特聚落領袖；在北魏滅亡之際，加入北魏軍隊，任“儀同”職，即為國家所授之鄉團統帥稱號。

山西太原市出土的《虞弘墓誌》（開皇十二年/592年撰），記載則更明顯：他在北周滅北齊後，“詔充可比大使，兼領鄉團。大象末，左丞相府，遷領并、代、介三州鄉團，檢校薩保府。”¹⁶“檢校薩保府”說明他監領粟特聚落，而同時又領鄉團，恐怕這些鄉團與粟特聚落不會完全沒有關係，三州鄉團中應該也有粟特人的鄉團組織¹⁷。

唐高宗時許敬宗等所編《文館詞林》卷四五五，現存日本天理圖書館藏抄本，乃天下孤本，其中有關題碑文一篇，山下將司氏確認其為《安修仁碑》¹⁸。該碑記碑主

¹¹山下將司《新出土史料より見た北朝末・唐初間ソグド人の存在形態——固原出土史氏墓誌を中心》，《唐代史研究》第7號，2004年8月，60-77頁；又《隋・唐初の河西ソグド人軍團——天理圖書館藏〈文館詞林〉〈安修仁墓誌銘〉殘卷をめぐる》，《東方学》第110輯，2005年7月，65-78頁；蘇航《北朝末期至隋末唐初粟特聚落鄉團武裝論述》，《文史》2005年第4輯，2005年11月，173-186頁。

¹²這幾個例子出自蘇航上引文，有的是我提示給他的。

¹³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61-62頁。

¹⁴此誌出土於統萬城，存陝西省靖邊縣文管所，筆者兩次往訪，據原石錄文。

¹⁵我在2004年4月23-25日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等單位舉辦的“粟特人在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口頭提出這裏的“天主”應當是“祆主”，但因為這個墓誌材料還沒有正式公佈，所以尚未加以正式的論證。

¹⁶張慶捷《〈虞弘墓誌〉中的幾個問題》，《文物》2001年第1期，102頁。

¹⁷參見姜伯勤《隋檢校薩寶虞弘墓石槨畫像石圖像程式試探》，原載巫鴻主編《漢唐之間文化藝術的互動與交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此據《中國祆教藝術史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123頁；張慶捷《虞弘墓誌考釋》，162頁；楊曉春《隋〈虞弘墓誌〉所見史事繫年考證》，《文物》2004年第9期，78-79頁。

¹⁸羅國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173-174頁。我曾據陳明的提示使用了這個材料，並考證碑主之父為安元壽祖安羅，則碑主應為安興貴、修仁兄弟中的一位，見拙撰《北朝隋唐胡人聚落的宗教信仰與祆祠的社會功能》，榮新江主編《唐代宗教信仰與社會》，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8月，397頁；又《薩保與薩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領問題的爭論與辨析》，葉奕良編《伊朗學在中國論文集》第3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1月，140頁表及注1。隨後，

歷官爲：“隋開皇中，起家爲蜀王秀庫真，遷都督檢校儀同兵。及秀廢（602），又爲大都督領本鄉兵。”因爲安修仁一家爲涼州地區的世襲薩保，所以這裏所謂的“本鄉兵”，就更有可能是涼州粟特聚落的地方武裝。

有關粟特聚落向鄉團和軍府的轉變是近年來粟特研究的一個重要進步，但問題並沒有全部解決。

粟特聚落的武裝力量被逐漸轉移成地方武裝的鄉團或者進入國家的府兵系統，這無疑是粟特聚落向鄉里轉變的一個方面。但是，我們還應當注意到，安伽墓誌的誌蓋題“大周同州薩保安君之墓誌記”，誌文的題名作“大周大都督同州薩保安君墓誌銘”，表明他去世的時候，雖然已經擁有“大都督”的頭銜，但仍然是薩保，也就是說他所掌控的粟特聚落並沒有解體爲鄉里。翟曹明墓誌題“夏州天主儀同翟君墓誌”，也是粟特官職“天主”和北周官職“儀同”並列。《元和姓纂》輯本“安姓”下“姑臧涼州”條記：“後魏安難陀至孫盤婆羅，代居涼州，爲薩寶。生興貴……修仁。”或許說明在安修仁之前，安家一直是涼州薩保，到安修仁則未提其任薩保之職，而《安修仁碑》恰好說他是以“大都督領本鄉兵”，似表明從薩保統屬的聚落變爲大都督統領的鄉里，可能就發生在隋仁壽二年（602）前後。

三、隋唐時期粟特聚落向鄉里的轉變

隋朝祚短，許多已經開始的做法因爲隋末的動亂而中止，粟特聚落在短時間內又出現一種回潮現象，像涼州、原州、并州等地都有強大的粟特胡人武裝割據勢力，據《龍潤墓誌》記載，唐朝創建後，并州仍有薩寶府的設置¹⁹。

唐朝建立後，把處於正式州縣中的胡人聚落改作鄉里，兩京地區城鎮中的胡人不會再以聚落的形式存在，西州的崇化鄉安樂里，敦煌的從化鄉，大概都是由胡人聚落改建的。但是，因爲中央和地方政府對一些地區的控制力度有強有弱，使得不同地方從聚落到鄉里的轉變進程也不是同步的，而且有的地方還有反覆；邊境地區如六胡州、營州柳城等地的胡人聚落，應當繼續存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央政府對粟特聚落的控制表現爲一個逐步的過程。因此，在某些地方薩保府制度並未終結，所以《通典》卷四〇《職官典》以及其他史料表明，直到開元、天寶年間，唐朝的職官體系中仍有薩寶府職官的記錄，如薩寶府祿正、祿祝、長史、果毅、薩寶府率、薩

山下將司氏據江戶時代日本學者尾崎雅嘉所纂《群書一覽別錄》中所載《文館詞林》目錄記卷四五有“右驍騎將軍安修仁碑銘一首并序”，判斷此碑文實即安修仁碑殘文，見所撰《隋·唐初の河西ソグド人軍團——天理圖書館藏〈文館詞林〉〈安修仁墓誌銘〉殘卷をめぐって》，69-71頁。

¹⁹ 《隋唐五代墓誌匯編·山西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992年，8頁；《全唐文補遺》第5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111頁。參看榮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薩寶府與粟特聚落》，《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174-176頁。

寶府史等等²⁰，最近公佈的《天聖令》中所保存的唐開元二十五年令，也有“薩寶府、史”和“薩保府雜使”的記錄²¹，這說明在大唐帝國的某些邊緣地帶，仍有薩寶府的存在。

對於不同地區粟特聚落向鄉里的轉變，我們來考察一下幾個典型的例子：

1. 鄯善地區

鄯善地區位於今羅布泊南的若羌地區，在唐朝初年屬於西域範圍。敦煌寫本《沙州圖經》記載：

石城鎮，本漢樓蘭國。隋置鄯善鎮，隋亂，其城遂廢。貞觀中（627-649），康國大首領康豔典東來，居此城，胡人隨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上元二年（675）改為石城鎮，隸沙州。

屯城，西去石城鎮一百八十里。胡以西有鄯善大城，遂為小鄯善，今屯城也。

新城，東去石城鎮二百卅里。康豔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漢為弩之城。

蒲桃城，南去石城鎮四里。康豔典所築，種蒲桃於此城中，因號蒲桃城。

薩毗城，西北去石城鎮四百八十里。康豔典所築。其城近薩毗澤。²²

可見，這裏在貞觀年間（627-649）是無人管轄的地區，被從康國東來的大首領康豔典率眾佔領，因成聚落。到高宗上元二年（675），隨著唐朝在西域的擴張，把這一胡人轄區改成唐朝的鎮級行政區劃，並直接隸屬於沙州。這其實是把胡人聚落改變成唐朝的軍鎮，因為這裏仍是西域地區，不知是否建立了鄉里體制，但應當有相應的行政組織。至於軍鎮的軍政長官——鎮將，唐朝仍然讓粟特首領來擔任。《沙州圖經》還記載武周天授二年（691）的石城鎮將為康拂耽延²³，一般認為他應當是康豔典的後人。

鄯善胡人聚落向軍鎮的轉變，是胡人聚落轉變的一個類型，時間在高宗上元二年。

²⁰《通典》卷四〇《內外官品·流外官》，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106頁。

²¹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聖令整理課題組校證《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卷三十《雜令》校錄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375-376頁，唐8條。

²²池田溫《沙州圖經略考》，91-93頁。

²³同上，82頁。

2. 高昌地區

從吐魯番安樂城出土的《金光明經》題記可知，430年時高昌城東立有供奉胡天的祆祠，它的存在，表明信奉祆教的粟特人的存在，因為從石城鎮、伊州、敦煌、涼州等地的情形看，祆祠往往立在粟特胡人聚落當中²⁴。近年來巴達木鄉發現的康氏家族墓地，可以表明粟特人原本聚族而居的情況²⁵。《麴氏高昌永平二年（550）十二月卅日祀部班示為知祀人上名及謫罰事》記有“薩薄（簿）”（即薩保）²⁶，是政府任命的管理粟特胡人聚落的官員，所以證明高昌國時期胡人聚落的確實存在，並受到高昌官府的控制，其首領也納入高昌國的職官體系。

唐朝貞觀十四年（640）滅高昌，建立直轄的西州，實行與內地一樣的鄉里城坊體制，高昌國範圍內的胡人可能在重新建立鄉里體制時就被編入鄉里。然而，粟特人在640年以後仍在持續不斷地進入高昌地區。據阿斯塔那35號墓出土的《唐神龍三年（707）高昌縣崇化鄉點籍樣》，該鄉安樂里的住戶幾乎都是粟特胡人，而崇化鄉的其他里則多有漢姓戶口²⁷。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安樂里的粟特人名直譯者較多，年齡大多數在四十以上，而且非常集中，表明他們原本是生活在粟特聚落中的胡人，在神龍三年前四十年之內的某個時間，被西州地方官府編入鄉里。從707年上溯40年，也沒有到貞觀十四年，這說明崇化鄉安樂里的胡人從聚落向鄉里的轉變，應當是在唐滅高昌國、建立西州的二、三十年以後的事情。

3. 敦煌地區

從已經確定的粟特文古信札的內容來看，早在4世紀初葉，敦煌就有了以粟特商人為主體的自治聚落，而且伴隨有祆教祠舍²⁸。

由於敦煌藏經洞發現了大量的漢文文書，使我們今天對於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有了較其他地方都詳盡的瞭解。池田溫先生《8世紀中葉敦煌的粟特人聚落》一文，根據《唐天寶十載（751）敦煌縣差科簿》所記從化鄉人名的姓氏多為粟特式胡名，判斷出唐朝敦煌十三鄉之一的從化鄉，就是在粟特聚落的基礎上建立的，其位置恰好

²⁴榮新江《吐魯番出土〈金光明經〉寫本題記與祆教初傳高昌問題》，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2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年12月，1-13頁+圖版1。

²⁵榮新江《新出吐魯番文書所見的粟特人》，《吐魯番學研究》2007年第1期，34-35頁。

²⁶《吐魯番出土文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136頁；《吐魯番出土文書》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45-47頁。

²⁷參看池田溫《神龍三年高昌縣崇化鄉點籍樣について》，《中國古代の法と社會・栗原益男先生古稀記念論集》，東京：汲古書院，1988年，248-250、257-258頁；姜伯勤《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167-174頁。

²⁸W. B. Henning,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B SOAS*, XII, 1948, pp.601-615; N.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Merchants in China and India", *Cina e Iran: da Alessandro Magno alla Dinastia Tang*, ed. A. Cadonna e L. Lanciotti, Firenze 1996, pp.45-67.

就在敦煌城東一里的祆舍所在地，這裏又稱安城，為粟特民眾精神信仰的中心。他還推斷從化鄉的居民應當是唐朝初年集團性移居此地的，聚落的建立最早可以追溯到隋代，最晚在7世紀中葉。他詳細研究了從化鄉居民的種族構成、家庭形態、公務負擔、身份結構，以及他們與敦煌其他鄉民眾相比在商業上的特性。8世紀中葉開始，由於粟特地區的動盪、唐朝的內亂、吐蕃對河西的佔領，從化鄉居民漸漸減少。到8世紀末吐蕃佔領敦煌後，最終消亡²⁹。陳國燦先生以為《唐長安三年（703）三月敦煌縣錄事董文徹牒》中尚無從化鄉，而景龍元年（707）西突厥故將阿史那闕啜忠節勒兵攻于闐坎城，大概迫使播仙鎮和石城鎮的粟特人東遷敦煌，這可能是從化鄉的來歷³⁰。

我們知道，敦煌的從化鄉是建立在祆祠附近，這所祆祠在武周時期（甚至上元年間）成書的《沙州圖經》中就有記錄，所以圍繞這個祆祠的粟特聚落可能早就存在。沙州敦煌縣從化鄉的來歷，不必求之於外在的原因，而應當是敦煌本地粟特聚落的演變結果。因此，池田溫先生推斷的隋朝或唐初成立從化鄉的看法是可取的。

敦煌文書 S.542 背《吐蕃戍年（818）六月沙州諸寺丁仕車牛役簿》第177行大乘寺部分，有“安薩保：守囚五日，營田夫五日”的記錄³¹。這是吐蕃時沒入佛教寺院的粟特寺戶的派役條記，這裏的“薩保”，一種可能是取自“菩薩保佑”的意思；另一種可能是來自“薩保”的本來意義，那在此它只是一個純粹的人名，而不是胡人首領。值得指出的是，唐朝文獻把胡人聚落首領都寫作“薩寶”，這裏卻寫作“薩保”，這也說明它不是唐朝時真正意義上的薩寶。

4. 六胡州地區

《元和郡縣圖志》卷四關內道新宥州條記：“調露元年（679），於靈州南界置魯、麗、含、塞、依、契等六州，以處突厥降戶，時人謂之‘六胡州’。”³²《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一》宥州寧朔郡條記：“調露元年，於靈、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魯州、麗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為刺史，謂之六胡州。所謂‘六胡州’。”多出一句“以唐人為刺史”的話，因此，有的學者認為六胡州的性質不同於一般的羈縻州，而與唐朝內地的一般州府相同³³。我們的確看到有以漢人為刺史的例子，如《張仁楚墓誌》記：“聖曆元年（698），改授朝議大夫、依州刺史。”³⁴但是，調露元年以

²⁹池田溫《8世紀中葉に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人聚落》，《ユーラシア文化研究》第1號，1965年，49-92頁。

³⁰陳國燦《唐五代敦煌縣鄉里制的演變》，《敦煌研究》1989年第5期，39-50頁。

³¹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79年，533頁。

³²《元和郡縣圖志》卷四關內道新宥州條，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106頁。

³³周偉洲《唐代的六胡州與“康待賓之亂”》，《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400-401頁。

³⁴周紹良編《唐代墓誌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022頁。拙文《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國學研究》第6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此據《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94頁揭

後仍然有以粟特胡人為刺史的例子，如李至遠《唐維州刺史安侯神道碑》記永隆二年（681）安附國下葬時，其次子安思恭任魯州刺史³⁵。因此，是否以唐人為刺史，對於六胡州來說並不重要，並不能以此來證明它們的性質。大概緣此之故，《元和志》並沒有用這句話。

通過前人的研究，六胡州的民眾以原本進入突厥汗國境內的粟特胡人為主體的，這一點應當沒有疑問。學者們大多數也承認，這些民眾主要是貞觀四年隨東突厥汗國的破滅而降唐的胡部民眾。那麼他們在調露元年唐朝建立六胡州之前是什麼樣的形態呢？很可能還是以在漠北時期的部落為單元，而來源則是粟特聚落集團。可以肯定，當六胡州建立以後，這些州的行政體制已經按照唐朝的州縣鄉里制度設置起來，如1985年寧夏回族自治區鹽池縣西北約48公里處發現的《何府君墓誌》，稱其“以久視元年（700）九月七日終於魯州如魯縣□□里私第，春秋八十有五”³⁶。唐朝顯然希望用州、縣、里的體制，來統轄六胡州的粟特居民。

然而，我們從史料中看到的這裏的粟特民眾，卻是長期保持着以畜牧為主的生活方式。王義康氏從唐朝經常徵用六胡州的精兵出征作戰來說明六胡州的粟特人主要從事畜牧業，因而保持着部落組織形式，帶有“柘羯”性質³⁷。陳海濤氏認為這些從東突厥南下的粟特人至少在698年之前仍然保存著原本的部落存在形式，所以保持着很強的戰鬥力³⁸。學者們也早就注意到六胡州粟特人是在唐朝監牧系統中從事畜牧的民眾³⁹。

這種畜牧的生產方式，也促成胡人的聚居形態。因此，雖然唐朝為這些粟特人建立了州縣，但他們恐怕仍然以部落的形式聚集在一起；而且名義上他們都屬於各自不同的州，但六胡州這個總的稱呼一直保存著，如洛陽出土的《唐故陸胡州大首領安君（菩）墓誌》表明，這方在景龍三年（709）十月廿六日合葬於洛陽龍門的安菩及其夫人何氏的墓誌，仍稱早在麟德元年（664）十一月七日去世的安菩為“六胡州大首領”，似乎說明六胡州作為一個集合名稱要比分別設立的魯、麗等六個州名響亮得多，對於胡人也更有聚合感。

雖然六胡州的大首領如安菩進入了唐朝中央政府，但這裏仍然保留了聚居胡人

出這條史料，可惜此前討論六胡州者多未見到。

³⁵ 《全唐文》卷四三五，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4435頁上欄。

³⁶ 《文物》1988年第9期，56頁。

³⁷ 王義康《六胡州的變遷與六州的種族》，《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第4輯，149-156頁。

³⁸ 陳海濤《唐代粟特人聚落六胡州的性質及始末》，《內蒙古社會科學》2002年第5期，40-44頁。

³⁹ 參看張廣達《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學學報》1986年第2期；此據作者《文本、圖像與文化流傳》，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85頁；艾沖《論毛烏素沙漠形成與唐代六胡州土地利用的關係》，《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103-104頁；穆渭生《唐代設置六胡州的歷史地理考察》，《唐都學刊》第23卷第3期，2007年，24-25頁；山下將司《唐的監牧制と中國在住ソグド人の牧馬》，《東洋史研究》第66卷第4期，2008年，539-569頁。

的強大實力，到開元九年四月至八月，六胡州康待賓、安慕容、何黑奴、石神奴、康鐵頭等率眾反叛唐朝。這些起事首領多帶有突厥的葉護官銜和唐朝的大將軍、將軍等武散銜，但從姓氏來看，無疑都是九姓胡人。他們攻佔六胡州，有部眾七萬人。不久，這場起義被唐朔方大總管王晙、隴右節度使郭知運、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王毛仲、天兵軍節度大使張說等鎮壓下去。同年八月到翌年九月，蘭池州的胡人康願子又起兵反叛，自稱可汗。張說發兵再次平定。唐廷決定移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於（水災以後的江淮地區的）許、汝、唐、鄧、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⁴⁰。然而，被移徙的粟特胡人懷戀本土，漸次逃回。開元十八年，唐朝復為置匡、長二州。開元二十六年，唐朝為遷回胡戶置宥州及延恩、懷德、歸仁三縣⁴¹。

六胡州的民眾沒有改變其原本在突厥部落中的畜牧、鬥戰的習性，因此雖然在行政體制上已經被編入鄉里組織，但六胡州作為胡人聚居的地方，仍然保持著許多粟特聚落特徵，民眾沒有地著，也沒有被打散，所以這裏可以說沒有完成從聚落到鄉里的轉化過程。在安祿山在河北的勢力壯大後，一些六胡州的民眾進入河北地區，成為安祿山隊伍中的重要成員。中晚唐時期，隨著沙陀的興起，六胡州民族又大量東遷到河東地區，成為晚唐強大的沙陀三部的的主要組成部分⁴²。

5. 營州柳城

關於營州柳城的胡人聚落，沒有直接的史料，但我們可以從安祿山的事迹中推斷出來的。

中唐人姚汝能《安祿山事迹》卷上記：

安祿山，營州雜種胡也。小名軋犖山。母，阿史德氏，為突厥巫。無子，禱軋犖山神，應而生焉。是夜，赤光傍照，群獸四鳴。望氣者見妖星芒熾，落其穹廬。怪兆奇異，不可悉數。其母以為神，遂命名“軋犖山”焉。少孤，隨母在突厥中。母後嫁胡將軍安波注兄延偃。

開元初，延偃族落破。胡將軍安道買男孝節，并波注男思順、文貞，俱逃出突厥中。道買次男貞節為嵐州別駕收之。祿山年十餘歲，貞節與其兄孝節相攜而至，遂與祿山及思順並為兄弟。乃冒姓安氏，名“祿山”焉。長而奸賊殘忍，多智計，善揣人情，解九蕃語，為諸蕃互市牙郎。⁴³

⁴⁰《舊唐書》卷八《玄宗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184頁；《資治通鑑》卷二二玄宗開元十年八月，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6752頁。

⁴¹《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975頁。

⁴²小野川秀美《河曲六州胡の沿革》，《東亞人文學報》第1卷第4號，1942年，203-218頁；森部豐《唐末五代の代北におけるソグド系突厥と沙陀》，《東洋史研究》第62卷第4號，2004年，68-75頁。

⁴³《安祿山事迹》，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本，1983年，1頁。按上海古籍標點本、Robert des Rotours 標點

安祿山從小就進入安延偃的族落當中，也即漠北突厥汗國中獨立的“胡部”⁴⁴；其名字“軋犂山”或“祿山”（粟特語 roxšan 音譯）是地道的粟特人名；他通曉多種語言；善於經商或管理商業市場；又擅長粟特人的舞蹈，“作胡旋舞，其疾如風”⁴⁵。

《安祿山事迹》卷下原注云：

史思明，營州雜種胡也。本名“宰干”，玄宗改爲“思明”。瘦小，少髭鬚，深目鳶肩，性剛急。與祿山同鄉，生較祿山先一日。思明歲夜生，祿山歲日生。及長，相親，俱以騎勇聞。解六蕃語，同爲牙郎⁴⁶。

安史之亂的另一主角史思明，也是營州雜種胡。所謂“同鄉”，實即同出一個部落的意思。史思明的本名“宰干”，應當和軋犂山一樣，是粟特語的音譯，其意或許就是玄宗改名的“思明”⁴⁷。史思明從出生到成長都和安祿山有共同之處，“解六蕃語，同爲牙郎”，說明他也是個地道的粟特人。

開元初（713年以後），安祿山等人輾轉來到柳城。天寶元年（742），康阿義又率部落民眾大批到達。可以說，開元、天寶年間，柳城地區形成一個相當規模的粟特胡人聚集區，其時唐朝對這裏的控制力不強，因此他們很多應當就生活在粟特聚落當中。高適《營州歌》吟詠的大概就是當時的情形：“營州少年滿原野，狐裘蒙茸獵城下。虜酒千鍾不醉人，胡兒十歲能騎馬。”⁴⁸ 因爲當地游離在唐朝和東北民族政權之間，所以其聚落保存的時間較長，因而形成了以安祿山爲首的胡人集團。

《安祿山事迹》卷上又記安祿山任幽州節度使後：“潛於諸道商胡興販，每歲輸異方珍貨計百萬數。每商至，則祿山胡服，坐重床，燒香列珍寶，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羅拜於下，邀福於天。祿山盛陳牲牢，諸巫擊鼓、歌舞，至暮而散。”⁴⁹ 我曾指出這裏記載的實際上是安祿山和部下在幽州祭祀祆神的場景。由此反推，同類的祭祀活動應當也發生在柳城胡人聚落當中。

從安祿山的事跡來看，營州柳城胡人聚落的變遷，恐怕要等到安祿山等人進入唐朝軍事系統以後，可惜我們沒有進一步的史料來考察當地胡人聚落的變遷情形。

本文在前人研究粟特商隊、粟特聚落，以及粟特聚落首領薩保的成果基礎上，對薩保或其他粟特聚落首領向地方鄉團、府兵領袖過渡的情形做了補充。然後舉石城、

譯注本 *Histoire de Ngan Lou chan (Ngan Lou chan che tsi)*, Paris 1962, p.2 和 E. G. Pulleyblank,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7, 均將“禱軋犂山神”之“神”字下屬，實誤。“軋犂山”非山名，而是神名。

⁴⁴ 護雅夫《東突厥汗國內的粟特人部落》，《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I，東京：山川出版社，1975年。

⁴⁵ 《安祿山事迹》卷上，6頁。

⁴⁶ 標點本 42頁；Pulleyblank, op.cit., pp.16-17; R. des Rotours, op. cit., pp.321-322.

⁴⁷ 參看榮新江《安祿山的種族與宗教信仰》，《第三屆中國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1997年；此據作者《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229頁。

⁴⁸ 《全唐詩》卷二一四，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2242頁。

⁴⁹ 標點本 12頁；R. des Rotours. op.cit., pp.108-109.

高昌、敦煌、六胡州、營州柳城等地粟特胡人聚落向鄉里變遷的不同情況，強調粟特聚落的轉化，並不是唐朝初年短時間裏完成的，在不同的地域有著不同的時間，轉化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安史之亂以後，在唐中央政府控制範圍之內的胡人聚落，早已變成唐朝各級官府直轄的鄉里，薩保已經名存實亡，居民產業結構發生變化，婚姻形態從胡人與胡人通婚向胡漢結合為主過渡，祆教信仰逐漸世俗化，一些胡人甚至皈依了漢地傳統的佛教、道教。但同時，也有大批粟特胡人東遷河北三鎮，尋求自己新的安身之地，繼續保持一些舊有的聚落形態⁵⁰。五代時期，一些生長在沙陀部中的粟特後裔重新登上歷史的舞臺，甚至坐上皇帝的寶座。但進入宋朝以後，胡人最終融入中國社會。米芾，從姓氏來看是明顯的粟特胡人後裔，但已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

⁵⁰參看榮新江《安史之亂後粟特胡人的動向》，紀宗安、湯開建主編《暨南史學》第2輯，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12月（2004年4月出版），102-123頁。